

中國美術全集

工藝美術編 8
漆器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

✓
中國美術全集

工藝美術編 8 漆 器

中國美術全集

工藝美術編 8 漆器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

本卷主編 王世襄 朱家溍

出版者 文物出版社

(北京五四大街二十九號)

責任編輯 周成

封面設計 仇德虎

版面設計 晨舟

圖版攝影 胡錘 劉志崗

張仲清 郭羣

孫克讓 孫之常

印刷者 百花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

一九八九年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國內版定價 一九〇元

版權所有

凡例

一 《中國美術全集》分繪畫編、雕塑編、工藝美術編、建築藝術編、書法篆刻編五部份，每編分若干冊。

二 《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漆器》卷，內容分爲三部份：一、專論，二、彩色圖版，三、圖版說明。

三 本卷對國內現存的上起新石器時代，下至清代的各類漆器，均予精選收錄。其中元代以前的漆器，以考古發掘品爲主；元代以後的漆器，則以各地博物館珍藏的傳世品爲主。

四 本卷選錄的漆器按時代順序編排，同時儘可能將同類漆器適當集中。

五 爲使漆器名稱規範化，本卷選錄的漆器已根據編者所擬的標準統一命名。

中國古代漆工藝

王世襄

一 新石器時代

——上溯七千年，尚未找到用漆的起源

中華民族是一個勤勞聰穎、富有創造性的民族，一個不斷提高精神和物質文明、愛美而又善於審美的民族。在我們祖先多種多樣的發明創造中，採割天然漆樹的汁液，用來作日用品的粘合劑、增固劑，並進而加工煉製，摻調色料，使之光彩奪目，絢麗生輝，再用此做成形態各異、用途廣濶、花色繁多的工藝品和美術品，這自然是一項對人類有重大貢獻、可誇耀於世界的傑出成就。因此循流溯源，學術界一直都想搞清楚天然漆最早在何時使用，漆器最早在何時出現。

我國古代文獻記載的使用漆器的時間很早。《韓非子·十過篇》講到虞舜做食器，「流漆墨其上。禹做祭器，黑漆其外而朱畫其內」^(一)。這就說明，虞舜、夏禹時代已有一色和朱黑兩色漆器。不過古代文獻一定要有實物證明纔能使人相信。因此要解答漆器起源問題，我們祇能把希望寄托在科學的考古發掘上。

一九五五年在江蘇吳江團結村良渚文化遺存中清理出漆繪彩陶杯^(二)。一九五九年在吳江梅堰的遺址中又發現棕地黃紅兩色彩繪黑陶壺。後者經化學試驗，彩繪物質與漢代漆器的反應相同，而和仰韶文化的彩陶、吳江紅衣陶的試驗結果迥異^(三)。良渚文化的年代約為公元前三三〇〇年至公元前二二〇〇年。

一九七三年在江蘇常州圩墩下層的馬家浜文化中發現喇叭形器，上端塗成黑色，下端塗成

暗紅色。另有一殘件，表面塗黑色。紅黑塗料微有光澤，直觀和現在的漆無區別(四)。馬家浜文化比良渚文化還早約一千年。

一九七七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遼寧敖漢旗大甸子墓葬中發現兩件近似觚形的薄胎朱色漆器，色澤鮮明(五)。墓葬遺物經碳十四測定，距今約為三千四百年至三千六百年。

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四年在山西襄汾陶寺墓地發現彩繪木器。胎骨雖已腐朽，尚可辨認出為鼓、豆、案、俎等物。其中的木豆，彩皮剝落時呈捲狀，與漆皮相似。發掘者認為這一發現對揭示古代北方漆器的淵源，不無意義(六)。陶寺正處在晉西南「夏墟」的範圍內，距今約三千八百年至四千年。

一九七八年更有驚人的發現，在距今約七千年的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第三文化層中清理出一件木碗，腹部瓜稜形，圈足，內外都有朱色塗料(七)。後經植物研究所採用微量容積進行熱裂收集試驗，確認木碗上的塗料為生漆(八)。這是目前所知我國最早的漆器(圖版二)。

最近的發現又從浙江餘杭安溪鄉瑤山傳來，一九八七年五月在九號墓中發掘出一件嵌玉高柄朱漆杯(九)。這證明良渚文化的漆器已和玉雕相結合，超過實用品而成為藝術品(圖版三)。

儘管上面列舉了多次早期漆器的發現，但天然漆何時最早使用，漆器何時最早出現等問題並未得到解決。理由是現知最早的漆器河姆渡木碗已經使用了調朱的漆來髹飾。從事物發展規律來看，從用本色天然漆到用調朱漆來髹器，其間肯定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因此要解答上面提出的問題，還有待今後的考古發現。不過根據已有的材料，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看法：

- 一、漆的使用時間已被我國考古發掘所得到的各類漆器推得越來越早，因此可以自豪地說漆器是中華民族的發明創造。
- 二、在新石器時代髹漆工藝已經發展到彩繪、鑲嵌等較高水平。
- 三、遠古漆器分佈頗廣，不祇是某一地區、某一文化纔有。

二 商 西周 春秋

鑲嵌、螺鈿、彩繪漆器已達到高度水平

時代處於夏、商之交的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往往被定為早商。一九七八年在這裏的大墓中發現紅漆木匣，是貯放狗骨的容具（一〇）。一九八一年在兩座墓中發現鉢、觚、鼓等器，表面都髹朱漆（一一）。一九八四年又發現盒、觚各一件。盒扁圓形，髹朱漆；觚已損壞變形（一二）。

時代早於殷墟、文化層年代相當於河南鄭州二里崗遺址的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一九七四年從墓葬清理出十多塊槨板灰，一面有精細雕花，一面光素塗朱。其中最大的兩塊都陰刻饕餮紋和雷紋，每兩組圖案間的陰文部份塗朱，陽面塗黑，出土時色彩斑斕。發掘者認為解放前在安陽侯家莊商王大墓的木槨頂部，發現過多塊饕餮、雲雷和虎紋木雕板灰（圖版四——五）。當時判斷為送葬的儀仗，被稱為「花土」。今有此墓發現，可斷言它們也是雕花木槨的遺痕（二三）。再證以一九七六年安陽小屯村北的發掘，在一七號墓中發現槨、棺的部份殘存及其板灰。最上層保存較好的槨板，表面刻陽文龍，髹朱漆；陰文地，髹黑漆。棺木南端漆皮尚好，黑地朱文，綫條很細（二四）。綜上所述，可知所謂「花土」或「板灰」，都是彩漆雕花木板的遺痕。因為祇有漆纔具有抗腐、耐酸、經久不變的性能，其他塗料都不可能埋藏了三千多年，木質化成灰土，而表面塗層色澤猶新的。

可以代表商代漆器最高成就的當推河北藁城臺西村遺址中出土的漆器。所出器物雖殘，尚能辨認為盤、盒等。其工藝為木胎雕花紋後髹朱黑兩色漆。花紋有饕餮、夔、雷、圓點、蕉葉等多種（圖版六）。在饕餮的眼睛和眼角，鑲有經過磨琢的方、圓、三角形的綠松石，可謂技藝複雜、製作考究、裝飾華美（二五）。更為出人意想的是在一件漆盒的朽痕中，發現半圓形金飾薄片，正面陰刻雲雷紋，背面有朱漆痕跡，顯然是原來貼在漆盒上的金箔（二六）。漢代流行在漆器上鑲嵌金銀箔花紋的工藝可以溯源至此。

河南羅山天湖有商代晚期的墓地，一九八〇年在此出土了十件漆器，其中的光唇斂口平底木碗，髹黑漆，經觀察乃取邊材板斲製而成（二七）。它可能是現知最早的一件車斲木胎漆器（圖版七）。引人注目的是一件木柶殘件，在握手部位隱起方格雲雷紋。發掘者指出，每組圖案為四層方格和一個十字，係由五層絲綫纏繞而成（二八）。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方格花紋高低顯著。如用絲綫層層平繞，是無法使圖案有高低之分的。故其工藝究竟如何，還有待進一步的觀察。不過無論如何，商代已出現表面不平、和後代堆漆近似的漆器了（圖版八）。

現知年代最早的皮甲是安陽侯家莊一〇〇四號墓中發現的皮甲殘跡，有黑、紅、白、黃四色圖案花紋（二九）。鑒於春秋、戰國時期的皮甲多髹色漆，我們有理由相信商代已有漆甲。故不妨說後代十分流行的皮革胎漆器，其始也不晚於商代。

實物證明，商代漆器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祇是年代遼遠，缺少完整的器物保存到今天，目前祇能就印痕贖跡來瞻玩其花紋裝飾，從殘形斷片來緬想其貌態風神。

西周漆器自本世紀三十年代以來，在河南、陝西、湖北等省不斷有所發現，可惜也大都殘壞，不能看到完整形象。可以代表這一時期的漆器在本世紀八十年代以前也尚未發掘出來，因而過去一直低估了它的成就。

最早是一九三三年郭寶鈞先生在西周衛國墓中發現蚌泡，因出土時多環繞在其他器物的周圍，意識到蚌泡當是其他器物的配飾（三〇）。二十年後在陝西長安普渡村西周一號墓發現圍繞在陶器周圍的蚌泡，上面留有附着的漆皮。由於漆皮有摺皺和重疊，推測漆皮裏面原有一層木質或編織的腔（三一）。所謂的「腔」，實際上就是漆器的胎骨。繼而在河南陝縣上村嶺虢國墓地（三二）和洛陽龐家溝（三三）先後發現外壁嵌有六枚蚌泡的漆豆和套在盃豆之外的嵌有蚌泡的漆器托殘片。至此纔算看到了嵌着蚌泡的西周漆器。一九六七年在陝西長安張家坡西周晚期墓中發現漆豆、漆俎和僅有小部殘存的漆杯。豆為深盤粗把，盤周壁鑲嵌蚌泡八枚，柄鑲嵌小蚌泡四枚及菱形蚌片，以上蚌泡均塗紅彩。俎上部為長方形盤，口大底小，四壁斜收，盤下接四足方座，四周鑲嵌各種形狀的蚌片圖案（三四）。這次發現使人們對西周漆器又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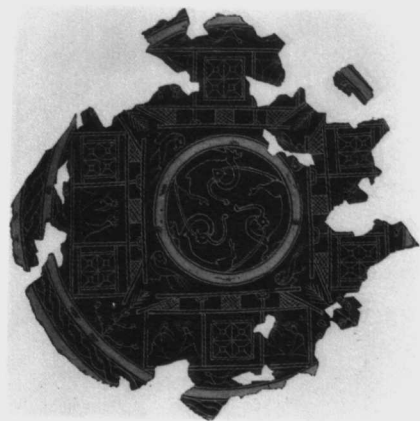
使我們看到可以代表西周髹飾成就的漆器是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三年在北京琉璃河燕國墓地一百二十一座墓葬中發掘出來的豆、觚、壺、盃、盤、俎等多種木胎漆器(二五)。殷璋璋同志曾對這批漆器撰寫專文，並對其中的三件作了詳細的描述：「漆壺和漆觚都是朱漆地、褐漆花紋。漆豆則是褐地朱彩。……豆盤上用蚌泡和蚌片鑲嵌，與上下的朱色弦紋組成裝飾紋帶；豆柄則用蚌片嵌出眉、目、鼻等部位，與朱漆紋樣合組成饕餮圖案。喇叭形的觚身上除了由淺雕的三條變形夔龍組成的花紋帶外，上下還貼有金箔三圈，並用綠松石鑲嵌。漆壺的裝飾紋樣最爲繁縟。除在朱漆地上繪出褐色的雲雷紋、弦紋等紋樣外，器蓋上還用細小的蚌片嵌出圓渦紋圖案，頸、肩、腹部也用很多加工成一定形狀的蚌片，嵌出鳳鳥、圓渦和饕餮的圖形。此外，在蓋和器身上還有附加的牛頭形飾件，器身中部有鳥頭形器把。這些鳥獸形象的附件上也用蚌片鑲嵌，使牛頭和鳳鳥的形象更加突出。」(二六)王巍同志在一篇有關西周漆器的文章中對漆壺的螺鈿工藝作了補充：「蚌片表面光滑平整，邊緣整齊，蚌片之間接縫十分緊密。」當時蚌片的磨製和鑲嵌技術都已達到相當水準，絕非螺鈿初始階段所能及。」(二七)(圖版九——一〇)

現在對西周漆器的認識已遠遠超過琉璃河燕國墓地發掘前的認識，這說明田野考古對工藝美術史研究有何等重要意義。過去筆者據西周漆器多嵌蚌泡，河南濬縣辛村還發現用截切過的蚌條組成「蚌組花紋」(二八)，提出我國的螺鈿漆器可以上溯到西周。但有人認爲筆者的看法值得商榷，並提出「螺鈿鑲嵌技術在南北朝時已能運用，……到中唐時期就達到了成熟的階段」(二九)。琉璃河漆器的發現證明了本人過去提出的看法並非出於武斷。

春秋時期的漆器有以下幾處比較重要的發現。

河南光山寶相寺黃君孟夫婦墓的時代爲春秋早期。主棺通髹黑漆，邊緣朱繪竊曲紋及波紋。棺蓋上大型竊曲紋也隱約可見。所出漆豆盤邊有圓圈紋，乃用漆繪來畫出蚌泡裝飾。豆柄花紋與西周銅器有相似處，都反映出它的時代風格(三〇)。

一九七一年在齊國故城所在地的山東臨淄郎家莊春秋晚期墓中發現了不少件漆器。引人注目的是一件圓形殘片，中心繪三獸翻滾嬉戲，外層屋宇四座。中有人物，躬身相向而立，或舉



一 彩繪屋宇人獸紋漆器殘片
(摹本) 春秋

物過頂，或雙手承接。屋宇之間，用鳥、雞、花草等填補空隙。發掘者指出殘片的花紋題材及章法佈局和其他地區出土的東周漆器皆異，故認為是齊國的風格(三二)(插圖一)。同墓還出土彩繪羊形(?)器及鎮墓獸。此種立體圓雕的動物形象祇有楚墓纔經常發現，今出於齊墓，值得重視。

山西長治分水嶺春秋晚期墓出土漆箱殘片，旁有銅鋪首，可知當時已用金屬飾件。殘片朱地黑紋，繪多條蟠繞的虬龍，上下左右，糾結在一起，構成整片通連的圖案，和蟠龍成組，組間有空隙的圖案頗異其趣。殘片邊緣或繪蟠螭紋，或繪竊曲紋，或繪幾何紋，變化繁多。有的花紋彷彿是兩行文字，中夾鍊條，是他處所未見的(三三)。長治另一古墓葬在長子縣內，所出漆器的紋飾與青銅器很相似，顯示了兩者的關係。罕見的器物有髹紅黑漆舟、編竹胎黑漆盒及扁壺(三三)。扁壺多在秦漢墓中出土，今在春秋晚期墓中發現是出乎意料的。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漆器多在河南、山東、山西偏北地區的墓葬出土，而在大量出土戰國漆器的湖北、湖南却發現得不多。我們期待着今後會有像北京琉璃河西周漆器那樣重要的春秋漆器的發現。

三 戰國 秦 西漢

—— 五百年的髹漆繁盛時期

就我國漆工藝的發展而言，歷史上第一次的突飛猛進、興盛繁榮，出現在戰國時期，且經久不衰，一直延續到西漢。

戰國漆器，產量之多、品種之備、製作之精、分佈之廣，都遠遠超過了前代。凡此均非偶然，而是和它的社會背景、經濟條件分不開的。

春秋以後，鐵製的刀鑿鉞斧等生產工具開始普遍使用。有此利器，工作效率提高，對以木胎為主的漆器生產，不僅提高了產量，也改進了質量。漆器作為日用品，有體輕、易洗、無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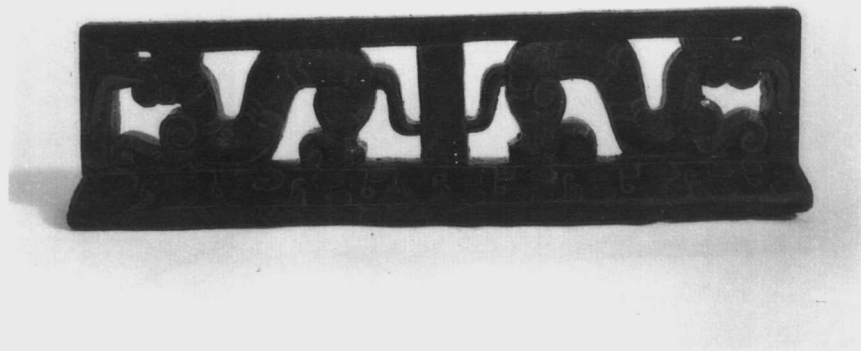
味、隔熱便於持握、抗酸耐腐蝕等特點，這些都優於銅器；作為觀賞品，漆彩加油彩，五光十色，花紋絢麗，更非銅器所能及。時迫戰國，以青銅器的輕重多寡來顯示統治者身份地位的禮制已趨沒落瓦解，故陵墓中的隨葬品，漆器增多而銅器減少。

戰國漆器大多數出自楚墓。楚國是戰國時期幅員最大的國家，已發掘的戰國墓也以楚墓為最多。漆器在楚文化中佔有重要地位。從另一個角度講，楚墓採用白膏泥密封木結構墓室的方法，對保存漆器極為有利，這也是我們得以從楚墓中見到大量戰國漆器的一個主要原因。

規模較大的楚墓多集中在湖北江陵。楚國故都紀南城（郢都）就在江陵境內。分佈於紀南城東垣外雨臺山上的楚墓羣，時代從春秋早期到戰國晚期。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六年間，共發掘了五百五十八座，計出土漆木器九百餘件，二十多種。出自戰國墓的漆器數量，遠遠超過春秋墓，其中的耳杯、圓盒、豆、鎮墓獸、虎座飛鳥等皆花紋精美。首次發現的有鴨形豆。豆盤與蓋合雕成一隻盤頸的鴨子，縮頭拳足，大有睡意。兩翼若排簫，羽毛似鱗片，均用紅、金、黃三色在黑漆地上繪出。豆柄及座也有卷雲紋等彩繪（圖版一八）。還有彩繪木雕蟠蛇漆卮，羣蛇交互蟠結，却很有規律。蓋上八蛇，四條紅蛇頭向蓋頂正中，四條黃蛇頭向蓋沿四周。卮身蟠蛇十二條，亦繁而不紊。此卮是一件經過精心設計的工藝品（三四）（圖版一七）。

拍馬山楚墓羣位於紀南城東南，時代也從春秋延續到戰國。兩次發掘清理了四十座墓葬，出土的重要漆器有彩繪鹿鼓、長方形盒、曲尺形盒、虎座鳥架鼓等（三五）。此鼓和葛陂寺所出的另一件是楚墓發掘中最早見到的、器形比較完整的兩件，因而《楚文化考古大事記》指出「為當時正在討論的河南信陽楚墓虎座鼓的復原問題，提供了實證資料」（三六），證明兩鳥相背、中間懸鼓的復原方案是正確的（三七）。

位於江陵城北面李家臺的楚墓內出土漆器二十二件，其中的方豆、高逾一米背插鹿角的虎座飛鳥都比較罕見，而以彩繪木盾最為難得。它正面以紅、黃、綠、藍等色繪曲尺、齒形圖案，背面則在六組虬龍之間盡情地加進了許多人物、花鳥。席地而坐的紅衣人、活躍在樹頭的小鳥、羽毛鮮艷的孔雀，無不各盡其態，富有生氣（三八）。



二
彩繪透雕雙龍漆座屏 戰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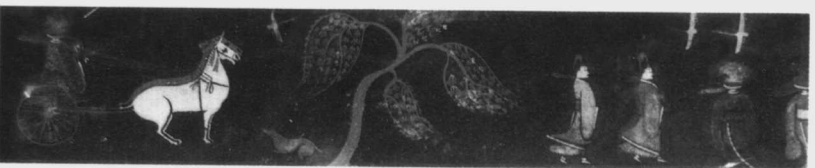
一九六五年對紀南城西北的望山一號、二號及沙塚一號三座戰國中期的大型墓進行了發掘〔三九〕。一號墓出土竹漆器一百餘件，品種繁多，其中有鎮墓獸、瑟、虎座鳥架鼓、案、酒具、篋、酒注、耳杯、盤、俎、豆、勺、工具箱、傘、蓋、弓、盾、劍、梳、奩、竹席等。當時轟動考古界的是一件精美絕倫的彩繪透雕座屏。底座兩端着地，中懸如橋，上承玲瓏剔透的矮屏，雕鏤鳳、鳥、鹿、蛙、蛇、蟒等動物形象共五十一個，銜接穿插，構成嚴格對稱而又非常生動的畫面。其中俯衝的鳥和奔馳的鹿使整體都活躍起來，觀者不禁為之贊歎。座屏上朱紅、灰綠、金、銀諸色咸備，彩繪絢麗奪目。推此為這一時期透雕漆器的代表作，當之無愧〔圖版二二〕。沙塚墓出土的耳杯和雙鳳雙獸透雕箭箛亦是精品〔圖版二〇——二一〕。

天星觀戰國中期特大楚墓在紀南城東長湖之濱，雖多次被盜，破壞嚴重，仍清理出大量漆器。鎮墓獸高達一百七十厘米，方座上兩獸相背，長舌下垂，各插雙鹿角，枒槎擎空，造型怪譎，在同類明器中如此高大的實屬罕見。彩繪雙龍、四龍透雕座屏各一具，與望山楚墓所出的品種相同，但刀法粗獷，風格又異〔圖版二五〕（插圖二）。最精美的是龍首車轆，浮雕多種雲紋，黑漆地上用紅、黃漆彩繪，勾劃鱗片及密點星紋，裝飾效果使人聯想到錯金銀器〔四〇〕。

以出土大量絲繡而膺「絲綢寶庫」之名的江陵馬山一號墓也發現重要漆器。其中耳杯兩件，一畫雲紋六卷，一施藍彩，花紋用色，均屬罕見。朱繪黑漆盤為夾紵胎，是戰國時期少數實例之一〔四二〕。漆扇一把，竹管作柄，竹片為框，中用細而薄的篾條髹塗紅黑兩色漆後編織出矩形圖案，更以小十字紋填實矩形並周匝矩外。此扇色彩鮮明，紋樣整齊，工藝精巧，是戰國竹漆器的代表作〔四二〕。

江陵地區還有太暉觀〔四三〕、溪峨山〔四四〕、藤店〔四五〕等地的戰國楚墓出土了大量漆器，惟其重要性未能超過前已述及者，茲從畧。

一九八七年纔挖掘完畢的荊門包山大塚，南距紀南城十餘公里，時代為戰國中晚期。內棺出土時漆彩如新。棺上圖案為龍紋交疊於鳳紋之下，有鳳翔雲中、龍潛水底之勢〔圖版二三〕。塚內出土的鳳鳥雙連杯，口張銜珠，尾翹作柄，身軀兩杯相並，造型新穎。在另一件漆奩上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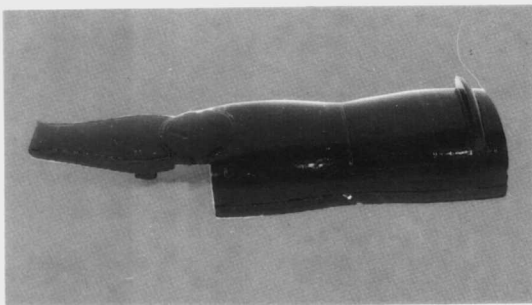
三 彩繪出行圖夾紵胎漆奩（展開圖） 戰國

綫描加平塗之法畫出車馬四乘，御者、乘者、侍者二十六人，並以迎風楊柳、展翅飛鴻點綴其間，構成一幅絕妙的車馬人物出行圖（四六）（圖版二四）（插圖三）。

江陵地區以外湖北省境內的戰國墓以隨州市曾侯乙墓最為突出。曾國即為見於史籍的隨國，它與楚文化的關係十分密切。曾侯乙墓所出重要漆器，多到難以備述。舉其最者，如內棺，繪有直立如人的怪鳥、持戈守衛的神獸，洋溢着神秘的楚風（圖版一二）。漆木蓋豆，造型獨特，兩耳雕鏤甚繁，和同墓的青銅尊、盤等風格一致。鴛鴦形盒，頭部可以轉動，彩繪羽毛，腹側又分別描繪撞鐘擊磬、敲鼓舞蹈的場面，比雨臺山鴨形豆更為寫實，可謂並臻佳妙（圖



四 彩繪二十八宿圖像漆匱 戰國



五 黑漆十絃琴 戰國

版一一)。彩繪二十八宿圖像漆匱載有我國關於二十八宿全部名稱的最早文字記錄(插圖四)。除此之外，還有多種漆竹、漆木樂器，如琴(插圖五)、笙、笛、簫(圖版一三)等。它們不僅是珍貴漆器，也是天文、音樂等學科的重要文物(四七)。

湖南長沙是又一個楚墓集中的地區。新中國成立後，對楚文化的考古發掘是從這裏開始的。和江陵相比，此處墓葬多屬中小型，但三十多年來還是有不少重要發現。

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長沙發掘了七十二座戰國墓，於四〇六號墓中清理出黑地朱黃兩色的彩繪皮胎漆盾，在當時是首次發現(四八)。

一九五二年在長沙近郊發掘了一百五十多座東周墓，於顏家嶺戰國墓中發現狩獵紋卮，在當時認為是描繪最精、保存又最好的漆器(四九)。

瀏城橋一號墓是長沙地區規模較大、保存較好的戰國早期墓，出土漆木器五十九件，有漆繪木鹿，浮雕精緻、面板下有斜棖支撐的黑漆几等，而漆繪工整華美的竹節形戈柄及竹箭箝尚未計算在內(五〇)。

戰國中期墓有三處出土重要漆器。長沙南郊左家公山木槨墓首次發現毛筆，筆桿上塗漆(五一)。長沙五里牌楚墓出土體態肥碩、通身描繪雲鳳紋的漆虎子，是一件精製的圓雕漆器。彩繪龍鳳紋十絃琴，面板頭寬尾窄而上翹。由於它和曾侯乙墓所出的一件十分相似，使人相信戰國時琴的形制就是如此(五二)。長沙烈士公園三號墓，解放前被盜，多件漆器流往海外。已知去向的有「廿九年」銘文卮，現藏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此為秦昭襄王時物，「廿九年」，即公元前二七八年(五三)。

戰國晚期墓有長沙北郊的楊家灣六號墓，出土漆器二十六件。一具朱繪鳳紋盒的蓋內有陰刻「王二」兩字(五四)，這種可能是私家製器的銘記當時是很少見的。

長沙以外湖南省境內的楚墓有兩處值得注意。臨澧一號墓所出漆器使用了金箔貼花(五五)，常德德山墓出土的漆奩為夾紵胎(五六)，這些都是戰國時罕見、到漢代纔流行的技法。

湖北、湖南兩省以外出土漆器的楚墓首推河南信陽長臺關一號墓(五七)，數量之多，繪飾之



精，曾轟動考古界，予人前所未有之感。金銀彩繪漆案，朱漆地上排列三十六窠綠、金、黑三色圓渦紋，邊緣繪金、黃、紅、綠四色連雲紋。朱繪黑漆大牀，六足透雕卷虺紋，用竹、木及銅質鑲角作牀欄。在此墓出土的衆多珍貴漆器中，彩繪錦瑟尤佳，內容從手持麾節、登壇作法的巫師，人面鳥身和鳥頭人身的怪物，糾纏難分、互相廝殺的龍蛇，直到兩犬逐鹿、肩擡死獸、跪地烹調、彈瑟吹笙等現實生活場面，妙景聯翩，目不暇給。其工處細入微芒，但落筆却一揮而就，真可謂「意存筆先，畫盡意在」，藝術價值之高，歎為觀止〔五八〕。在這裏我們看到了戰國繪畫的卓越成就（圖版一五）。河南固始侯古堆勾啟夫人墓出土黑漆彩繪盤龍木雕、鎮墓獸及多種髹漆樂器，其中的夔龍紋有柄斝鼓為首次發現〔五九〕。安徽舒城秦橋戰國晚期墓出土耳杯有針刻工名，大漆盒有錯金銅釦，花紋生動流暢，亦屬罕見〔六〇〕。特別是漆盒造型圓而高，不類楚器而和戰國早期已出現的秦器相似，其間的淵源關係值得探索。

楚文化以外戰國漆器的出土地區首先應提到四川。四川榮經曾家溝戰國早期墓就出土有圓奩、耳杯、雙耳長盒、雙耳長杯等。圓奩由身及蓋扣套而成，蓋頂及底用厚木作胎，器壁用薄木圈成。其一蓋上刻「成」字，蓋內刻「成」二字。經發掘者考證，後者即「成造」兩字，表明此器製於「成」地。雙耳長盒蓋與器身扣合而成，兩端有方形器耳，木胎完成後尙未髹飾。雙耳長杯，有身無蓋，等於雙耳長盒的一半〔六一〕。

四川青川七十二座戰國墓出土漆器一百七十七件。品種有壺、扁壺、耳杯、雙耳長盒、碗、奩、卮、匕、圓盒及圓雕鴟鴞壺（插圖六）。其中不少件有針劃符號及文字。可以辨認的如卮及奩上的「成」，耳杯上的「東」等。在第五十號墓中還出土木牘，記載秦武王二年（公元前三〇九年）命更修田律事〔六一〕。

榮經縣古城坪戰國晚期墓中還清理出圓盒、圓奩、耳杯、雙耳長杯、匕、耳杯盒、扁壺等。這批漆器中有十件署朱書「王邦」兩字，有的底上還烙有「成亭」二字。西漢初年，邦字避高祖諱，故發掘者將墓的年代定為戰國晚期至秦之間〔六二〕。

上述各墓所出漆器年代雖有先後，但風格一致，屬於同一文化體系，顯然和出自楚墓的不

同。楚墓所出漆器中常有鎮墓獸、虎座鳥架鼓、木雕鹿等，而滎經、青川戰國墓中却一件也沒有，所出全部是生活用具。至於雙耳長杯、扁壺又是楚墓所無的，就是雙耳長盒在楚墓中也非常罕見。楚墓雖有圓盒，但造型多矮扁，和滎經、青川所出的直徑與身高約相等的亦異。楚墓奩盒的蓋和器身多子口扣合，而滎經、青川的則蓋大身小，以蓋覆身，扣合成器。楚墓漆器針劃或漆書銘文者少見，而在滎經、青川的戰國漆器中則大量出現。如拋開楚墓，把滎經、青川所出漆器和時代稍晚的湖北雲夢睡虎地及河南泌陽官莊村的秦墓漆器相比則非常相似，使人確信滎經、青川這批墓均為戰國秦墓，而秦墓所出漆器自戰國到秦代是自成體系的。

由於滎經、青川所出漆器有「成亨」的針劃銘文或烙印戳記，不少學者認為是成都工官的製品〔六四〕。不過對工藝精湛的成都漆器是巴蜀固有的，還是由秦傳給巴蜀的則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秦滅巴蜀之後，受其影響纔開始發展自己的髹漆工藝〔六五〕。有人則認為秦的漆工藝上承商周，在滅了巴蜀之後纔把漆器製造技術帶到巴蜀地區〔六六〕。問題的澄清有待更多的考古發現。

四川省境內的戰國墓葬中發現重要漆器的還有新都的木槨墓。墓內出土的耳杯兩耳出尖，參差不對稱，畧似蝙蝠翼，為別處所未見。頭箱內有漆器殘跡，尚依稀可辨其原為木胎、篾胎或夾紵胎。發掘者認為此墓的年代可能在秦滅巴蜀（公元前三二九年）之前〔六七〕。成都羊子山一七二號墓，出土的器物有圓盒、奩、方釳漆器、圓釳漆器、大方釳器等。各件均鑲銅釳，有的釳上還有錯銀花紋。胎骨製作或木胎上刷灰後塗漆加朱繪，或木胎上貼編織物再塗漆〔六八〕，都比直接在木胎上髹漆前進了一步。就其工藝而言，此墓漆器應為戰國晚期的製品。

在全國範圍內發現戰國漆器的地方尚多，如山東棲霞出土的黑地朱紋殘片〔六九〕，河北懷來北辛堡出土髹墨綠色八角形奩頂式漆箱〔七〇〕，河北平山中山國墓出土的漆匣、漆奩〔七一〕，河南輝縣固圍村大墓出土的漆棺及大漆奩〔七二〕等，由於它們都偏在北方，所以也是值得注意的。

如上所述，難免會予人一種感覺，即戰國時期楚及受楚文化影響的地區漆工藝最發達，其



次是巴蜀。但這不一定完全符合歷史的真實。原因是楚墓之所以有大量漆器保存下來，和木槨外封白膏泥的墓葬有密切的關係。就是四川榮經、青川戰國秦墓，也是木槨外封白膏泥。至於其他地區，尤其是中原及北方，由於墓葬構造不同，對漆器保存不利。因此不能由於這些地區出土漆器不多而得出漆工藝不發達的結論。

秦代漆器過去所知甚少。自一九七五年以來，幾次重要考古發掘纔把這一時期的驚人成就展現於世，填補了戰國、西漢之間的一段空白。

一九七五年在湖北雲夢睡虎地發掘了十二座秦墓（七三），第七號墓（七四）入葬於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二五六年），秦統一中國以後的墓葬有五座（七五）。這次發掘共出土漆器近二百件。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在睡虎地又進行了兩次發掘（七六），出土漆器的數量及完好程度又超過了第一次。以上三次發掘共出土漆器五百六十多件，主要品種有鳳形勺、雙耳長盒、盃、圓盒、壺、扁壺、耳杯、長方形盒、盤、匕、樽、卮、圓奩、橢圓奩、杯等（圖版二六——三三）。

一九七八年河南泌陽官莊村發掘清理了四座墓葬，時代為秦末，出土漆器十七件，其中的圓盒、耳杯、樽等與雲夢所出的都很相似（七七）（圖版三四——三五）（插圖七——八）。

取雲夢、泌陽所出的漆器和榮經、青川的相印證，可明顯看出它們屬同一工藝體系。惟時間的推移，至秦代而有了發展。例如鳳形勺，利用鳳背挖成勺，頭頸做成把，彩繪羽毛及頭部的細部，是前所未有的新品種。睡虎地三十四號秦墓出土的一件彩繪獸首鳳形勺，尤為奇特（圖版二七）。戰國的奩多作圓形，雲夢却出了不少件橢圓形奩（圖版三三）。雙耳長盒青川出土的或祇髹黑漆，或僅朱繪器口，而雲夢的多施精美圖案，於兩端繪近似眼睛的花紋，利用突出的器耳畫成彷彿豬豚的嘴鼻，予人莊重而又詼諧的感覺。由於花紋多寫實，故呈現全新的面貌（圖版二六）。彩繪魚鷺紋盃，雖不甚工細，却筆簡神完（圖版二九）。彩繪扁壺上雄壯有力的犀牛、並肩前進的奔馬和飛鳥，均為前所未有。一件耳杯，內底祇畫小魚兩尾，別無紋飾，更是從繁縟的裝飾中解脫出來的大膽突破。至於圖案也有創新，大量使用變形鳥頭紋（畧似外文